

当代学人丛书

知识人的精神私史

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

朱立立 著 ●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 / 朱立
立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5 (学人论丛)
ISBN 7-5426-1907-1

I. 知... II. 朱...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台湾省—
现代②作家评论—台湾省—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6365号

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

著 者 / 朱立立

策 划 / 刘宏伟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责任制作 / 沈 鹰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 枣庄龙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4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1/32

字 数 / 225千字

印 张 / 9.75

印 数 / 1 3000

ISBN7-5426-1907-1

I·218 定价: 20.00元

序 言

刘登翰

台湾的现代主义风潮，自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由诗与绘画发端，恣肆横溢，迅速波及到小说、戏剧、音乐、舞蹈等多个文学艺术门类。尽管初期还带有某些模仿和生涩的痕迹，特别其与传统的格格不入，曾经遭到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批评乃至阻挠，被指斥为“背弃传统”、“脱离现实”等等。但恰是这些批评，帮助现代主义的弄潮儿们从自己成功或不成功的实践中，深刻省思，以本土的“中国方式”和现实的“精神投射”，重新为现代主义在中国塑形和定义，使这股最初飘起于西方的艺术风潮，找到它在中国的现实土壤，甚至成为一个时期台湾文学的主要代表，波浪起伏地延续到今日，并以其叛逆的现代精神，涵化在多种艺术思潮之中。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回眸这股众说纷纭，至今仍还褒贬不一的风潮，越加感到它对台湾文学发展的意义。事实证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当代台湾文学进程中问题和争论最多，因而也最生机勃勃、最富于创造力和涌现出最多重要作家与作品的一个时期。

如果把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更大背景上来看，它的价值便更进一步地凸现出来。现代主义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寻求启蒙的文学火种之一。不过，在当时危机重重的历史环境中，现代主义始终未能进入以启蒙民众、救亡国家为主要职责的文学的主流，只以其偏锋的新颖和锐敏，蜿蜒在艺术与现实的夹缝之中。逮至50年代，更在日益加

剧的极左思潮的笼罩下，被判为“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遭到严厉的谴责和批判，而几致消亡。恰是这时，它蜿蜒的流脉在台湾突破重围的异军崛起，不仅丰富和完整了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而且和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重新在祖国大陆复苏一道，见证了这一艺术的顽强生命力。

因此，当朱立立告诉我，她决定选择台湾的现代主义小说，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时，我十分赞同。近二三十年来，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从诗到小说和戏剧，虽然备受海内外台湾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论文也层出不穷，但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所呈现的独异的“中国方式”和作为一种精神历程的内涵，仍然还有许多未及深入和发现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探寻。

为了避免重复别人的研究，朱立立选择了一条并不轻松的道路。她把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的风行，作为裹挟在中国历史进程巨大跌宕之中的台湾知识者的精神私史来探寻，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泰勒等人的认同理论，作为打开知识者心灵世界神秘之窗的钥匙。这样，作者不仅找到了自己探索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独特思路，而且把反映战后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精神危机的某些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学（其中最为典型并影响深远的是存在主义），和台湾特定历史背景下知识者的精神焦虑与忧患对接起来，使其对现代主义的解读，落脚在台湾的现实土壤上。这个解读，不仅破解了以为现代主义是脱离台湾社会现实的误会，而且从精神层面上，揭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刻本质。同样，作者还从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包含分裂意识和苦恼意识，即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精神的悲剧意识与喜剧意识的论析中得到启发，把台湾末世情绪笼罩下认同存在主义悲剧的自我迷失与异化的现代派，和作为对末世情绪精神反弹的追求内在自我自

由与个性的浪漫性，看成是战后台湾知识者的两个精神向度，同构地进行对比观照。作者的这一分析，不仅在理论意义上对厘清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与联系有一定价值，而且对揭示战后台湾知识者精神奥秘的丰富性具有重要意义。再之，作者还从精神现象的哲学意义上，来看待台湾现代派作家表述自己认同焦虑与危机的困难的书写方式，即“以隐喻晦涩的形式书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苦闷挣扎的精神世界，一个具有世纪末情结的世界，一个以艺术形式表达反叛意识与革命性的语言世界”。在作者的分析中，语言和文体，所谓纯粹的形式，都已经不再“纯粹”，而“有意味”地成为表现这一代知识者“困难存在”的一种“困难的媒介”。台湾现代派作家某些语言和文体的“怪异”与“荒诞”，正是为了表征他们精神内在的“怪异”与“荒诞”。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作者从精神史的角度，透过现代派小说文本解读而对台湾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剖析，摆脱了一般作家作品论的论述模式，具有较强的理论穿透力。

我曾经读过朱立立以往的一些文章。她是一个相当感性并具有较高悟性的研究者。她的优势本来在于对文本的体悟和解读，这是她的长处，也是她的不足。攻博三年，她努力从理论上提高自己，从这部专著中她对理论不无艰难的把握，可以看到她可喜的进步。相对说来，可能由于论文本身的体例与架构等因素，她充满悟性与感性的文本分析优势，反倒受到一定制约。此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了避开重蹈前人研究的足迹，她尽量选择一些前人讨论较少的文本作为分析的对象。如讨论王文兴，一般评说较多的是《家变》，而她用更多篇幅剖析了王文兴自称“认真读过的不会超过十人”的《背海的人》；而过去台湾现代派小说研究者较少论及的李永平、王尚义等作家作品，她也都纳入了

分析的视域。这些努力显示出作者自己独具的视野和一种学术拓展的自觉意识。

现在这本书就摆在读者面前。不能说作者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任务。按照最初的设想，本书还有两个颇有意思的论题：身体书写和宗教意识。由于时间和篇幅等等原因，未及纳入。在一些具体论述中，也尚有可斟酌之处。但以我有限的阅读，我以为这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中对台湾现代派小说比较系统、全面且具有理论分析深度的一种。我愿意推荐给对此有兴趣的朋友。

博士、硕士论文历来是我最喜欢阅读的。尽管常常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不成熟之处，但恰恰是这种“不成熟”所具有的锐气和敏感，是许多“成熟”的文章中所读不到的。硕博论文是一个学者出发的基点。许多著名学者，他们的成名作和他们后来研究的最初基石，往往是他们学术生命开始的硕博论文；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硕博论文完成之后，即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作为学术生命的开始也成了学术生命的结束。我所希望于朱立立的当然是前者。台湾文学研究是一门看似热闹实却冷僻，且又阻碍着诸多非文学因素的学问，没有清醒的热情和冷静的恒心，是很难进行到底的。但台湾文学对于丰富和完整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和全景描述，又是必不可少的。为它付出热情与恒心，是值得的。这也是我对朱立立及许多进入这一领域的年青朋友的期待与祝愿。

匆匆，是为序。

2004年岁首

引 言

—

台湾现代派小说曾经以其心理表现的敏锐新颖及艺术上的锐意创新引人注目，也因其偏于内倾化精英化的表述方式以及先锋出格的美学实验而屡遭指责。作为在台湾文学史上产生过较大成就和持久影响的一种小说流脉，作为世界性现代主义文学家族中有着特殊生命形态和价值的一支，对台湾现代派小说的精神内涵和艺术探求，仍然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结束了半个世纪被殖民屈辱历史的台湾社会，二战后又陷入新的困窘。现代派小说就是战后台湾文化危机的产物，这种危机源于一种被迫从传统社会抽离所造成的精神的流离失所，也源于一种文化价值的迷失和自我身份的认同焦虑。战后台湾文化思潮几经流变，20世纪50年代，政治保守主义主宰一切，五四以来的左翼进步人文传统被人为割断，本土声音受到严厉打压，主流文化价值取向带有高压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60年代，西化派纷纷崛起，现代派文学“一方面是伴随西方政治经济涌入台湾的文化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台湾社会经济变迁对文学发展的一种现代意识的呼唤”。^①现代派叙事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西方和东洋文化殖民语境里的自我价值困惑，后发展现代化区域普遍产生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投射在其中；另一

① 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层面看，现代派文学激烈而真实地显现了台湾的中国人因国族分离带来的漂泊无根感。思想学术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思潮，带来了开放的叙述风尚和陌生化的形式元素，也传达出自身文化传统失范时向外寻求突围的强烈意向。台湾战后文学经历了政治化时期虚妄狂热的战斗文学，50年代感伤怀旧的怀乡文学，以及部分军旅作家的历史小说和灵异小说，人们内在地需要一种具有文学自律意识的、也更贴近心灵真实的文学叙事，现代派小说的兴起正是这种语境下新一代作者小说革新意识的反映。对于根基并不深厚的台湾新文学而言，现代派的小说观念与书写方式显得新异而陌生，富有挑战性；这种革命性或挑战性不限于形式，也不限于文学的内部。战后混乱、迷惘、压抑的时代情绪需要沉淀和宣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存在主义等思潮相互交错汇聚，与浪漫精神合流，正真实地显现了五六十年代抵御官方专制话语的叛逆性亚文化思想情绪。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主义等外来文化资源进入台湾，尤其是进入以知识分子为主流的小说创作之后，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外来文化，而是在多年的现代化潮流中逐渐融进了本土文化之中。现代派小说家创造了一批已经被典律化的汉语文学文本，《台北人》、《家变》、《我爱黑眼珠》等已经成为20世纪台湾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经典。^①现代主义风潮过后，出现了规模更大或更成熟的现代派文本，如长篇小说《背海的人》、《孽子》、《海东青》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现代派群落产生了为汉语读者广为接受的温和现代派作家白先勇，也出现了受到海内外学者

^① 这里提及的几部作品（集）都被列入台湾《联合报》1999年评选出的50年来“三十部台湾文学经典”之中；《亚洲周刊》评选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台北人》与《家变》榜上有名。

好评却难以被大众接受的激烈现代派作家王文兴，以及女作家欧阳子、陈若曦、施淑青等。战后不同世代的不少台湾作家都沉迷过现代派小说叙述，如被文学史遗忘的兼具现代意识与浪漫气质的外省作家王尚义，生于台湾的零余者、“隐遁的小角色”七等生，“流浪的中国人”聂华苓、丛甦、马森，后来向现代主义反戈一击的杰出小说家陈映真，未曾受到汉语文学界应有关注的偏执现代主义者李永平，一直锐意创新、与现代主义藕断丝连的乡土作家王桢和……正是这些个性迥异的作家用他们各自的方式，选择了现代主义这种发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为参照物，构筑出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动态的台湾现代主义精神。

我把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精神现象，也理解为个体认同危机与文化认同焦虑的一种复杂呈现方式，一种战后台湾知识者精神私史的文学叙事。在我看来，现代派小说的涌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部分现代知识分子企图在传统文化解体的情况下，吸收西方现代文化资源，取他山之石再造自己的艺术殿堂，并且通过小说世界的营造，来寻求精神突围，建构自我认同。我选择精神史这个研究视角，意图借助现代派小说的文本解读，探析历史与现实暧昧纠缠中的台湾现代派小说的精神世界，一窥战后台湾社会体制和知识场域中知识人独特的精神形态和存在价值。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一部人类寻求自我精神本质的历史，对于人类寻求自我精神根源的冲动有着深刻的论述。在这种精神哲学看来，人的自我意识包含了苦恼意识与分裂意识：“苦恼意识……是应该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自身确信的悲剧的命运。在它的这种确信中，它是丧失了一切本质性[一切价值和意义]，甚至是丧失了自己关于本质性的这种自身知识的意识，——换言之

之，它是丧失了实体和自我[主体]的意识；苦恼意识是痛苦，这痛苦可以用这样一句冷酷的话来表达，即上帝已经死了。”^①苦恼意识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悲剧意识，它表明异化世界潜在着，使人与其本质之间发生了抽象的偏离，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个体性的失败。而到了分裂意识那里，“异化世界则是直接的现实存在，人与赤裸裸的对象世界相对抗。这是一个人与其本质现实分裂的世界，人直接感受到现实社会的陌生、僵硬与冷酷。……分裂意识是一种喜剧意识，它对世界嬉笑怒骂，对它自己嬉笑怒骂的态度本身亦嬉笑怒骂，它用卑鄙下流来对抗罪恶肮脏。……通过对世界和自己的讽刺和批判，它的个体意识不但没有失去，反而更加明显了”^②。分裂意识是一种喜剧意识，在它的冲击下，现实世界的一切道德良心、政治体制、世俗伦常都土崩瓦解了，在否定性活动中，可以体验到嘲弄世界和自我嘲弄的快感。它通过对教化世界的扬弃达到一个新世界，但喜剧意识与苦恼意识相通，也是本质丧失的异化形式的意识形态，好比消极的漫画，以丑恶反抗丑恶，其底蕴仍是悲哀的。拉摩的侄儿正是这种分裂意识的代表。

黑格尔言说的是人类普遍的精神史，台湾现代派小说则演绎着具体真实的精神悲喜剧，既充满深重的苦恼意识即自我精神的悲剧意识，也不乏强烈的自我分裂意识即喜剧意识。现代派创作总体上保持了阴郁破碎的悲剧风格，自我的迷失、异化与超越是现代派苦恼意识的重心所在；现代派存在主义式的现代悲剧认

①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4月版，第230—231页。

② 高全喜：《自我意识论——〈精神现象学〉主体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53页。

同，现代派与浪漫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存在主义的接受与存在焦虑主题的不断浮现，表现内在精神困境的诡异出格的语言文体探索，以及与自我认同危机息息相关的身体叙述和宗教追寻，都在言说了现代派作家悲剧意识的复杂性。现代派小说的悲剧性要远远高于喜剧性，其间的忧患意识客观上赓续了“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①也是由战后台湾知识人对历史、文化与个人命运的痛苦认知所决定的。相对而言，现代派小说自我分裂意识即喜剧意识的表现层面，较少有人留意。但喜剧意识的自觉渗透，使台湾现代派小说哀感晦暗的精神世界增加了反讽和批判的力度，这在王文兴、王祯和等人的小说中表现得特别鲜明。这些黑色喜剧性较强的作品往往带有解构与嘲谑意味，不过骨子里仍然是浓浓的悲剧底蕴。现代派小说总体上的悲剧性倾向，真实流露了台湾知识人在情感、人性、文化与历史等层面的迷失与混乱，即认同的多重危机。

认同危机是战后台湾社会的一个突出的问题，现代派小说家敏感体验并在叙述中显现了这种危机。这里所谓的认同，既有爱里克森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内涵，也与查尔斯·泰勒对主体性的理解相一致：“就是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就是在家的感觉”，^②即一种自我的根源感。从现代派小说家笔端，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多重认同危机中的自我追寻有多么艰难。拔根之苦、失根之痛和寻根之难，根源的真实与虚幻、根源感的本真与自欺，是现代派作家此生拂之不去的生命难题，也

① 夏志青原著，刘绍铭编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3页。

② [加] 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序言，译林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页。

是我在阅读和思考现代派作品时反复为其感到痛苦不安的地方。对于那些突然被弃置于故土之外永难回归的外省籍作家，我以为，怎样的沉痛与颓丧都是可以想像的。那种无所归属的感觉最终聚长成一种命运、一种永恒的怀想与渴念。而本省籍作家，虽精神体验与前者并不全然相同，他们在生存上面临的艰难也许更为直接，他们同样也面临认同的困境和自我根源缺失之迷茫。黎湘萍对本省籍作家陈映真的读解，就颇为深切地揭示了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台湾的忧郁”。

另一方面，台湾现代派小说显示的自我根源危机问题，也与台湾以至世界性的现代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①泰勒则认为，在去魅^②的现代社会里，“明显可理解的宇宙意义秩序已经成为不可能”。^③舍勒也指出：现代社会的转型，“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④现代人已经意识到，现代性的断裂使人对生存处境和自我本源充满困惑，陷入价值的迷失，也就特别需要重建一种可靠的根源感。台湾现代派作家处身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个体与民族等多重矛盾中，自然也深刻感受到这种断裂，他们的小说实践也呈现出矛盾而复杂的精神形态。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体悟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② 去魅，这个概念原本是席勒提出的，后被韦伯引用说明世界的理性化，即世界的去魔化（Entzauberung），指“世界从具有‘魔力’的、神圣的或理念的场域”，被单纯看做一个中性的工具化领域。参见泰勒著作《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788页。

③ [加]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805页。

④ 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到寻根和建构现代认同的艰难，但他们仍然努力经由艺术理想的追求来实现自我价值，来寻找精神栖居之地。这方面，泰勒对于现代人“自我感和道德视界之间、认同与善之间的联系”的考察，以及对于浪漫和现代主义认同构成的讨论，对本论题的讨论有所启发。比如他认为现代主义从两个方面继承了浪漫的表现主义，“既反抗分解的工具性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又寻求可以恢复生活的深度、丰富性和意义的根源”。^①台湾现代派小说家中，白先勇、马森、王尚义、七等生等人都兼具浪漫气质与现代主义精神，就颇能体现泰勒所谓的现代认同的根本特征，即反抗世俗化工具化和对自我根源的不懈追寻。

以文学来纾解认同危机建构自我认同，在作品中呈现作家以及时代的精神现象，这并非现代派文学的专利，从某种程度看，甚至是所有文学共有的特征。只不过，现代派作品更突出人的主观性和内省性，更强调表现人的内面世界，因此也更适合运用精神史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它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观察视角。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个人经验取代了集体的传统成为现实的仲裁者，小说不再对神话、历史、传说倾注热情，而是从神与英雄的世界回到了人世生活。与史诗那种共享经验和民族记忆的集体性书写相比，个体已从集体的完整性里脱颖而出，小说无法再持续人类童年时期的言说方式，开始表达个人的知觉和个体的经验。在本雅明看来，小说注定是孤独的艺术。但是在卢卡契的眼中，这种个体性书写依然必须保持一种形式的完整性和思想的总体性，小说应该具有建构现代乌托邦的伦理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契称小说为史诗的替代，是现代社会的史诗。19世纪

① [加]查尔斯·泰勒著：《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780页。

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为卢卡契的这种论述提供了依据。然而，19、20 世纪之交涌现的现代主义潮流，卢卡契却无法归之于他的“总体性”名下。卢卡契认为，现代主义文学过于关心孤寂的人之心灵深处的意识活动，“把孤寂视为普遍的人类处境，是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独具的”。^①因此他批评现代派文学中的人物“是一种非历史的动物”。^②他指责现代主义思想的颓废虚无，更批评现代主义形式的破碎，在这一点上他与阿多诺之间形成了对立。卢卡契认为，社会的不完整性不能成为小说结构破碎语言破碎的理由，小说应当承担社会价值整合与人类精神救赎的功能；而阿多诺则指出，假如这个社会 and 人心本身就已经破碎不堪，那么小说所表现出的总体性岂不是一种虚妄？

正是从这里出发，阿多诺肯定了现代主义的正当性与批判性力量。在他看来，现代主义光怪陆离的衰败、阴暗无序的苦难背后，是常人无法洞察到的忧伤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深深地隐藏在灾难和绝望的密码里。阿多诺对现代主义最有力的辩护是：现代派小说残损破碎的形式本身，正与难以整合的现代社会与现代人心灵世界同构，在此意义上，阿多诺赋予了现代派小说形式实验一种哲学的意义。

现实主义是大众的艺术，以充分反映社会真相与民间疾苦为己任，它拥有一种建立在文学镜像本质预设基础上的自信：现实主义能够客观地总体地把握现实世界；而现代主义则是小众的艺术，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话语形式，是 20 世纪社会悲剧与文化危机在现代主观心灵世界的投影。它不再拥有现实主义那种完整

① 卢卡契：“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袁可嘉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5 月版，第 136 页。

② 袁可嘉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卷），第 146 页。

客观地把握现实的总体化自信，相反，它的哲学是建立在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怀疑论。如果说现实主义的最大功能在于有效地整合时代的征象，揭示社会现实，自信地形塑历史，那么现代派文学则绘影出失落信仰后现代人心灵的虚弱和恐惧，它不再对总体化的社会观照抱持信心，而是如阿多诺所言，以破碎化、主观化的感性方式表现个体主观的精神世界，以此折射一个失去了整合视界的现代社会。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技术理性的现代化，现代派文学表示了极大的质疑和批判，它因此扬弃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叙述成规，将聚焦点对准个体孤独寒冷而昏暗无序的内心。这样的内心聚焦，既可能因更细微地洞悉了一种主观化的真实，因而被广义的现实主义主动收编；也可能因对外在真实的不再信任，而被指责为“把世界看成一团不可知的神秘的混乱”。^①

台湾现代派小说基本属于这种主观内省型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形式，它同样体现了现代主义反思批判的特有方式和艺术效果。它以破碎化语言、扭曲文体、杂化文字、意识流等叙述形式，表现缺乏价值统合力而人心涣散的战后台湾社会，形塑知识分子破碎流离的精神世界。不同的传统与历史生长出并不全然相同的现代主义内涵，而相近的是传统价值失范后人心的普遍荒芜：西方基督教没落背景下的整合视界崩溃，是西方现代主义怀疑论的基础；而台湾现代派小说是两岸分离、儒教伦理失范背景下战后台湾人心灵碎片的投影。蔡源煌就曾准确地道出台湾五六十年代青年的普遍心态：“事实上，‘自我’概念的摸索也显示出当时年

^① 雅·艾里斯别格：“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见袁可嘉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卷），第254页。

轻人的主要关切。”^①自我的迷惘与追寻，也正是台湾现代派小说最为常见的主题。现代派小说较多书写个人的孤寂，个体生命的脆弱无助，部分作品也有将个人悲剧普遍化、人类化的倾向，流露出怀疑、绝望和虚无的心态。但不能因此断定台湾现代派文学必然脱离具体的历史时空，塑造的必然是卢卡契所谓“非历史的人”。白先勇的小说人物与主题充分显示了家国兴亡的历史感，王文兴的《家变》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崩溃的象征，礼运大同理想的破灭”。^②台湾现代派小说家其实是在困难地表达着战后台湾知识人认识世界与追寻自我的忧郁心声，他们通过文学形式的革命，转移和化解内心的迷惘、困顿，并且以此探索精神突围的可能。不能否认，台湾现代派小说文本往往潜流着晦暗的精神苦闷和驱之不去的感伤彷徨。返观这些如困兽之斗的精神苦闷，人们可以更为深切地返观他们置身的时代和处境。他们的艺术追求，也含有群体性的对战争苦难的怨愤与对命运的不甘。显然，他们希望艺术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存在的困境，并获得个人自我的以及民族文化的精神救赎。从这样的精神形态，我们可以认为，台湾现代派小说作者学习并借鉴了外来的艺术形式，却是在言说和表达自己切身的生命经验。

我相信，现代派小说的精神世界，以及战后台湾知识分子的认同建构与自我追寻，这会是个有意义的命题。所谓精神世界，并不意味着封闭的主观自我。真正的个体精神体验是深邃的也是开放的，与历史、与社会现实、与其他文本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交错与互动关系。对思潮脉动以及历史语境的关注和理解，就

① 蔡源煌：“《异乡人》的人我观”，《从〈蓝与黑〉到〈暗夜〉》，第129页。

② 刘绍铭：“十年来的台湾小说：1965—1975——兼论文兴的《家变》”，台北《中外文学》第4卷第12期，1976年5月，第4—16页。

成了观照现代派精神现象时无法回避的内容。战后两岸政治的分离，给两岸知识分子带来了不同的生存体验和命运遭际，本论题的深入探讨，可以从文学这一角为认识战后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现象打开一扇小小窗口，也为思考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提供一个不应遗忘的视域。与同时期大陆中国知识分子经受的身心炼狱隔海相对，台湾知识分子也经历了另一种形态的精神炼狱。以现代派小说作家为例，他们当中既有外省籍战后第二代，也有本省籍作家，既有学院派知识精英，也有贫民阶层的小知识分子，是一个富有包容力的知识群落。战后台湾，殖民语境被改写为国民党强人政治和戒严体制，农业社会向着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旧的价值观念崩溃、奇里斯玛^①权威丧失，冷战阴影笼罩……特殊的历史遭遇和生命体验使现代派作家群成为一群困难的人：认同的焦虑与表征的困难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两大困局。他们把精神突围的可能性寄托在相对纯洁纯粹的文学理想之中，文学成为他们消解痛苦的心灵栖居之地，创作形成了他们与虚无抗战的一种方式，既是他们找寻自我和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也成为建立新的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五四运动’给予我们创新求变的激励，而台湾历史的特殊发展也迫使我们着手建立一套合乎台湾现实的新价值观”。^②他们以隐喻和晦涩的形式，书写了一群特殊的中国知识人苦闷挣扎的精神世界，

① 奇里斯玛 (chrisma)，是韦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台湾学者译为“奇魅”，形容一种统治类型：“它显示个人或群体对某种特定价值的皈依。”这就形成了一种服从于奇魅人格的统治形态。因此奇魅型领袖的魅力成为维系这种统治的关键。参见陈晓林著《学术巨人与理性困境——韦伯、巴伯、哈伯玛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7 年 6 月版，第 103 页。

② 白先勇：“《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第六只手指》，文汇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版，第 177 页。